

#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09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09 年秋季号)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復旦大學 出版社

# 目 录

## 编 委 会

主编:张 冲

本期执行主编:张 冲

本期栏目负责:

曲卫国 张 琼

王 建 开

本期编辑:

庄彩云 郭 骅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何刚强

黄勇民 姜 宏

姜银国 陆谷孙

唐 敏 曲卫国

沈 黎 谈 峥

魏育青 熊学亮

张 冲 褚孝泉

朱永生

## 特别专稿

- 文化记忆与美国小说 ..... 埃默里·埃利奥特,金逸明译(3)  
国家梦想与警醒:美国小说的全球警示 ... 埃默里·埃利奥特,黄秀国译(10)

## 外国文学及文化研究

- 从比较文化角度看汉民族史诗、戏剧较晚发达的原因 ..... 汪洪章(19)  
呈现越战:黑尔《新闻快报》里的新新闻体 ..... 胡亚敏(25)  
性别权力机制中的身体表征  
——《大地》的身体政治研究 ..... 陈 靛(30)  
论品特式房间的间离效果 ..... 张雅琳(36)  
福音书情节在 20 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中的演绎 ..... 汪海霞(41)  
《昆虫的生活》  
——一部空间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小说 ..... 李新梅(46)  
都市空间中的“厨房”以及蔬菜、瓜果的形而上意义  
——吉本芭娜娜《厨房》论 ..... 李 征(51)  
《白藤江赋》与《前赤壁赋》之比较 ..... 潘秋云(58)  
“美国梦”与后多元时代的身份认同:任碧莲的“美国故事”解读  
..... 王月英 张 静(63)

## 语言学与教学研究

- 类型学的标记理论与英语非真实条件句的习得 ..... 张 勤 张 轶(71)  
话语意义的多模态构建  
——以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会徽为例 ..... 张帮印(78)  
下义关系中的下义词 ..... 曾建彬(85)  
建构主义发展观与现代“多维一体”口译多媒体教学解  
..... 康志峰 邱东林(92)  
从主位结构选择看中美大学生作文的差异 ..... 程 寅(100)  
词汇测试的新维度  
——心理词汇的构成与加工 ..... 乔晓妹(106)

## 辞典及翻译研究

### 培养用户,调整结构

- 中型英汉词典发展策略之我见 ..... 朱绩崧(115)

### 复指结构在口译中的运用

- 兼谈口译与口语的关系 ..... 姜 宏(119)

- 林纾转译日本近代小说《不如归》之底本考证 ..... 邹 波(123)

- 关于名著名译译名的若干思考 ..... 孙 靖(130)

### 从两元对立到三重范式

- 歌德的翻译与“世界文学” ..... 孙 瑜(134)

- 马丁·路德的译经伟绩与《关于翻译的公开信》 ..... 李晶浩(141)

# 特 别 专 稿



# 文化记忆与美国小说

埃默里·埃利奥特〔遗作〕  
(河滨加州大学·美国)

早在唐·德里罗出版厚达 827 页的对美国文化记忆的思考《地下世界》一书时,为纽约巨人队直播比赛并因对博比·汤普森赢得锦旗的全垒打的报道而闻名的电台广播员鲁斯·霍奇斯是这样评价该事件的:

这是一桩当他年老体弱、两眼昏花、头晕目眩时依然会在他的脑海里激荡的事情——进球时的澎湃情感,已经站着的人们一跃而起,爆发出阵阵呐喊与欢呼。这是一部公众历史,它有血有肉,再现了我们这场有惊无险的昔日比赛。时至今日,马球场<sup>①</sup>内的球迷们可以跟他们的孙子孙女讲这事——他们会变成活到下个世纪,呼吸中带有药味的老头,对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大谈,当此事发生时,他们正在这儿。<sup>②</sup>

德里罗的读者知道,他承认流行文化或“公众历史”的重要性,并会详细描述这样一件事情的巨大文化意义,尽管最终就算与发生在同一天的其他重要的事件相比,比如前苏联的第一次原子弹试爆,它的文化意义微不足道。这部小说还将汤普森的本垒打置于许多在 1951 年 10 月 3 日左右发生的社会及政治变革的背景之下。这些事件包括冷战的激化,约翰·埃德加·胡佛和 FBI 权利的变大,以及围绕国会的麦卡锡听证会而愈演愈烈的疑神疑鬼。然而,《地下世界》也将它的矛头指向了文化记忆,自省地批评了汤普森的本垒打和公众对当时艺人的谄媚之类的事情(比如对弗兰克·西纳特拉和杰克·格里森——至少在小说里,那天他俩都和约翰·埃德加·胡佛一起在场观赛),分散了公众对其他更重大、更紧要的事件的注意力。

在 1991 年《纽约时代周刊》杂志的一次访问中,德里罗表达了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看法,自那

以后,他曾多次重复这种看法,并在他 1991 年出版的小说《毛二世》中对此进行了最充分的阐述:

在一个压抑的社会中,作家能非常有影响力,可是在一个充满了超量供应和无止境的消费的社会中,恐怖行为可能是唯一有意义的行为。掌权的人秘密制定他们的计划,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增强那种权力。无权势的人们公然宣扬武力。真正的恐怖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想象。恐怖主义者的行为有一个深层的叙事结构,它们渗透并改变意识,就像作家们过去渴望做到的那样。<sup>③</sup>

在这次演讲中,我之后还将回到德里罗的《地下世界》,详细描述他是如何试图通过对美国文化的尖锐分析来渗透意识的。

—

有人要我思考一下文化记忆中的现象。当然,作为一个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我思考文化记忆就是发问: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走过了哪些路,以及我们可能走向何方。冷战开始时,美国人对广岛与长崎上空的蘑菇云有着生动的记忆,并且想象有一天美国的上空也可能升起类似的云朵。今天,我们记得最近一次烈火和浓烟的阴云在我们的城市上空升起,我们询问它的原因及美国应该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在全球扮演什么角色。我在让我知晓美国的理性与文化基础的我的研究中寻求回应这个挑战的答案。我对美国早期文学的研究工作让我见识了那些 17 世纪来到北美的英国新教徒的非凡能力,他们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在一场危险和艰苦的环境下过得不错。他们能这样,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宗教启示,他们相

① 马球场(Polo Ground):巨人队的主场。(译者注)

② DeLillo, Don. *Underworld*. N. Y.: Scribner, 1997. 60.

③ DeLillo, "DeLillo."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 Y.: New York, 1991. P. SM35.

信自己被神选中在人类与《圣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中担当主角。为了驱散任何有关上帝为他们设立的目标的疑问与困惑,他们的宗教领袖们执行严格的加尔文主义、摩尼教的两极对立逻辑:一个人不是与上帝同在就是与撒旦同行;不是将被救赎就是将被诅咒;不是成为圣徒团的一员就是变成荒野里的流浪者;不是美国的一份子就是恶魔一般的敌人。不存在中间地带,也没有灰色区域,只有对或错,天堂或地狱,黑或白。

凭借他们强烈的宗教信仰及运用语言来创造一个虚构的“新世界”的能力,早期的新英格兰人把他们自己视为新约里上帝的子民:他们逃离一个旧世界,穿越令人生畏的大海,建起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他们接到神圣的指示要在一块应许之地的山上建造一个基督之城,为世人树立一个光辉的完美榜样。通过不断重复一串这样的圣经预兆,他们构建起了一个共有的身份,它最终成为一个国家身份。他们运用叙述和描绘想象出一个非常强大的世界角色,一百五十年后,十分世俗的领导人,比如富兰克林、亚当斯、杰弗逊以及其他革命战争奠基人,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反对加尔文主义的神学,但他们依然会采用雄辩、描绘那些早年的公理会语言艺术家的神话去劝说农场主、商人和劳工来加入一场多数人都想参加的战争,去建立一个由十三个迥异且自我的殖民地构成的国家。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领袖们成功地利用两极对立的逻辑与神圣使命、天定命运论这样的花言巧语来将复杂的挑战简化为非此即彼的选择,通过暗示对方的观点来自地狱、甚至是更糟糕的纽约或加州<sup>①</sup>来压制对手的异议。

在这些语言策略继续影响并激励大家团结起来肩负国家使命的同时,这类形成已久的美国神话也导致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健忘症,因为不符合广泛认同的关于美国的文化信仰的过去事件与命题都被轻易地抹去或遗忘了。的确如此,如今,记忆丧失似乎成了一种国家疾病与困扰。比如说,在权利的最高层次,历史记忆仿佛是不存在的。当现在的政府宣布它入侵伊拉克的计划时,世界盟国、历史学家、政治分析家、记者及全球各地数百万的民众都在问,他们怎么能再一次干这样的事情?难道他们忘记了越南、索马

里、朝鲜及其他经常变为延绵战争的棘手冲突?选择性的记忆成就了基本的文化神话,比如美国人按神的旨意注定要进入荒野执行使命,这样的神话渗入了文化之魂或政治无意识的最深处,以至于事实无法战胜宗教命运。

## 二

鉴于这种选择性健忘,记忆丧失的问题似乎出现在许多层面上。在个人的层面上,数百万出生在20世纪40至50年代的人正在经历个人的记忆丧失。最近我在一个委员会议上学到了一个新的缩写词——CRS。每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并恳请其他人帮忙回忆某些细节时,大家就会大喊“CRS, CRS”。我被告知这个缩写词代表的是“Can't Remember Shit”(意为“屁都不记得”)。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婴儿潮那批人的父母越来越长寿,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因为亲人患上痴呆和阿尔兹海默氏症<sup>②</sup>而饱受痛苦。新近的电影《艾瑞斯》(*Iris*)就震撼地描绘了阿尔兹海默氏症对病人艾瑞斯·默多克及她的人生伴侣的影响。

流行文化对记忆丧失的焦虑可以在新近的许多流行电影中找到证据。2000年由盖·皮尔斯主演的复杂电影《记忆碎片》(*Memento*)令人惊讶地大受欢迎。该片的主人公饱受短期记忆丧失之苦,只能记得对话或事情十秒钟。他的妻子被强奸并谋杀,他正在追踪杀害她的凶手。为了做到这点,他将某些他需要经常回想的线索文在身上,然后每当他获知一条新信息时,他就必须很快记录下来。故事采取倒叙的结构,每十分钟为一个片段,时间顺序被打乱,于是观众也必须记得细节才能构筑其过去并决定哪些是可以相信的“事实”。

在2004年由德鲁·巴里摩尔和亚当·桑德勒主演的喜剧片《初恋50次》(*Fifty First Dates*)中,巴里·摩尔扮演的角色在一次车祸中头部受伤,导致每天晚上她都会丧失在车祸后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记忆。她的父亲和哥哥不想告诉她这个痛苦的真相,于是精心安排让她每天醒来都重复受伤前一天所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当桑德勒扮演的角色爱上她时,他

① For more on Puritan ethics and social constructs, see Sacvan Bercovitch, *Typology and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2; *The Puritan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Self*. New Haven: Yale UP, 1975; and *The American Jeremia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Also, see Emory Elliott, *Puritan Influenc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9 and *Power and the Pulpit in Puritan New Engl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5.

② 即老年痴呆症。(译者注)

说服她的父亲告诉她那晚忘记的事情。然后,为了让她过上稍微连贯的生活,三个男人精心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每天早晨给她看一盘录像带来告诉她那场车祸,并向她展示前一天的事情,这样当她再度看到自己的丈夫与孩子们时,就能知道他们是谁。

此外,在金·凯利2004年的电影《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中,凯利扮演的角色得知他的前女友关于他的全部记忆都被一名医生发明的大脑扫描仪抹去了。凯利的角色在愤怒之中也寻求了同样的逃避方式,但他却在记忆抹去的过程中苏醒了过来。他对前女友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的深层意识试图阻止记忆被抹去。在他的记忆闪回中,我们看到凯利的大脑在人类意愿与科技之间挣扎。他恢复了足够多的关于她的记忆,重新追求她。最后,通过一个精密的跟踪装置,他俩都重建了他们的记忆,并再度成为恋人(这赋予了老式的破镜重圆的故事一种新的高科技意义)。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看了根据1962年的同名电影重拍的《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和约翰·吴<sup>①</sup>的电影《记忆裂痕》(*Paycheck*),这两部影片都涉及抹去记忆的情节,带有强烈的隐喻。在1962年版本的《谍网迷魂》中,为了在美国策划一次政治暗杀,朝鲜的共产党用洗脑的技术改变了几名美国士兵的记忆。在重拍版中,这件邪恶的事情是由一家比任何政府都掌握了更多权力的跨国公司来干的,它利用大脑移植来指挥暗杀,以到达它的政治和经济目的。在《记忆裂痕》中,另一家全球公司雇佣了一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让他用三年的时间开发出一台可以揭示未来的机器,他同意在自己的研究结束后,让他们抹去他的记忆,这样他就不会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同样,在《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中——朵拉的记性也很差。

所有这些电影都煞费苦心地探讨了记忆丧失问题,无论它涉及的是对历史过去或个人经历的系统抹杀,还是由年老、疾病、事故或人为设计所造成的记忆丧失。好莱坞已经意识到当前这种公众迷惑力,或者说作家们受到驱使去写这些,这样的事实说明记忆及它的丧失已经在某些程度上成为一种国家困扰。

### 三

毫无疑问,在美国的历史上,文化记忆在构建共同的经历感、共同的过去及广泛持有的信念(这种信念在这个国家遭受9·11袭击后的几个月里盛行的

强烈国家团结感中尤为明显)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神话提醒我们:实际上只有在极端的国家危机时期(比如珍珠港遇袭、古巴导弹危机和伊朗人质危机),一种广泛分享的国家文化记忆才被大多数美国人所承认和信奉。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公民记得他们自己或他们家庭更受认可的文化,他们常常保持着自己之前文化的习俗、情结和强大的记忆,美国经常是一个挑战历史与文化记忆的故事的场所。在华盛顿广场上及美国其他主要城市里都有许多颂扬个人、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博物馆,这证明了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和我们许多文化记忆间持续不断的竞争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作为一名学者和美国文学的教师,我认为在大多数美国人觉得他们对美国的历史与文化有所了解这一点上,我们的严肃作家们始终持有一种高度的怀疑,他们常常受到一种愿望的驱使,想要揭示隐藏的真相、解构神话与假象、澄清被神化的事件与个人、重新想象过去、重造记忆,以便让它们可以满足现在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的需要。说到把文化记忆作为构建可能促进社会理解与宽容的共同团结的基础,我发现人们对文化记忆的价值始终存有疑问,文化记忆经常仅被视为怀旧与多愁善感的来源,它被认为时常会模糊或改变过去的实际事件——假设我们可以有所确定地了解它们。

在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叶,像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霍桑、爱伦·坡、斯托夫人和其他许多小说家的作品都表达了一种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带着这份乐观,他们将过去视为一个邪恶且黑暗的地方,认为它正被更进步、更先进的知识与理念所取代。比如,在《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中,故事从平切恩斯(Pyncheons)和莫尔(Maules)两家涉及犯罪和不公囚禁的阴郁的清教徒式的过去讲起,一直讲到一切错误都得以解决,年轻的菲比·平切恩斯与遭受诬陷的马修·莫尔的后代霍尔格拉夫拥有了一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美好未来。

然而,在同时期,与他们同辈的另一些作家的作品,比如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却经常暗示文化记忆只能告诉我们进步是一种假象,因为未来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太可能有别于过去的那些问题。事实上,库柏在后辈作家马克·吐温和威拉·凯瑟之前,率先哀悼了由于现代不负责任的物质态度造成积极价值观的丧失,比如本土美国人开明的

① 即我们熟知的著名导演吴宇森。(译者注)

环境准则。马克·吐温和凯瑟的作品经常描写美国式的希望(比如开国元勋们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与机会)是如何迅速消失的。在凯瑟的小说《我的安东尼亚》(*My Antonia*)的结尾处,故事的叙述者吉姆·波顿(Jim Burden)从内布拉斯加州的黑鹰镇回到东部,在那里,他见到了阔别二十年的朋友安东尼亚,他回忆了自己在包括他朋友安东尼亚和其他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子在内的贫穷的欧洲移民中长大的快乐。尽管他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成了一名成功的律师,吉姆内心依然怀有关于草原及草原上的那些人的珍贵记忆,正是这些人的奋斗与成功让他现在的生活显得空洞且微不足道。我一直觉得马克·吐温对美国历史健忘症的最佳嘲笑在于他赋予笔下典型的天真美国人哈克·费恩(Huck Finn)一个坏记性;哈克总是忘记他的各种化名,并一再抱怨说他曾知道那些现在可以帮到他的东西,只是他想不起来而已。一名处在青春期的 CRS 患者?在豪威尔斯(Howells)、詹姆斯(James)和沃顿(Wharton)的作品中,文化记忆似乎在他们的笔下人物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很小,但他们的人生选择所根植的乐观主义精神却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和美国例外论的神话上的。确实,许多像塞拉斯·拉帕姆(Silas Lapham)<sup>①</sup>、克里斯托夫·纽曼(Christopher Newman)<sup>②</sup>、伊莎贝尔·阿切尔(Isabel Archer)<sup>③</sup>和莉莉·巴斯(Lily Barth)<sup>④</sup>这样的人物很少提到他们的记忆或思考过去的教训,因为他们将精力集中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上,而他们的故事最终会揭示这个未来是虚假的。

在 20 世纪,有许多美国小说家的作品都详述了过去。在霍桑之后的很多年里,海明威(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尤其是福克纳(Faulkner)都探究了过去对现在的致命影响。在海明威的许多作品里,比如《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美国所处的整个西方历史,除了它文化独立的国家梦想,已经制造出一片迷惘的一代所身处的后世界末日时期的文化荒原。福克纳史诗般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对文化记忆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福克纳最后没有把美国南方当成一个例外的区域,而是将它当成了一个典型,以探究 18 世纪的错误(比如种族主义、奴隶制度、自我中心主义、

僵化作风及两极对立)是如何把南方变成荒原的,这片南方荒原不是独立于美国的其他地方而存在,而是预示着国家的衰弱与崩溃。在《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菲茨杰拉德让杰·盖茨比信奉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所传递出的希望,即在美国通过道德约束和机会便能取得成功,可盖茨比最终却发现一个贫穷男孩不会通向黛西的爱,黛西属于财富与特权,贫穷男孩的道路只会通向梅耶·沃尔夫山姆(Meyer Wolfsheim)<sup>⑤</sup>的地下世界,通向在另一片美国的荒原“灰烬谷”(the Valley of Ashes)附近的死亡。

#### 四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美国小说中出现了一条将它们大致分成独立的两大类的明显分界线。一方面,女性及少数裔的作家的作品基本属于社会现实主义及历史小说;另一方面,白人男性作家的作品则趋向实验、自省的后现代主义。在使用文化记忆方面,这两类小说也选取了相当不同的角度。大致而言,女性及自我意识强烈的少数裔作家试图重写过去,以求改正那些被抹去或扭曲的事件及个人历史,以求更深入地探索那些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同性恋厌恶及其他形式的偏见与迫害的受害者的生活与经历。

托尼·莫里森在《记忆遗迹》一文中,从 18、19 世纪超过一百个关于遭受奴役的人们故事里选了几个进行详细的论述。她评论了欧劳达·埃齐亚诺(Olaudah Equiano)、哈里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亨利·贝布(Henry Bibb)、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和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写的故事,莫里森说他们不仅帮助白人理解被奴役的个人的仁慈与他们所忍受的恐惧,而且这些文本也创造了虚假的美国文化记忆,因为文本的作者十分小心地避免细述会让白人读者感觉不舒服的经历。“每当有一件异常暴力的事情发生,或是一件异常淫秽的事情,或是一件‘过度’的事情,人们就会发现作家求

① 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的小说《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中的人物。(译者注)

② 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美国人》(*The American*)中的人物。(译者注)

③ 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贵妇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中的人物。(译者注)

④ 沃顿(Edith Wharton)的小说《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中的人物。(译者注)

⑤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译者注)

助于当时的文学套路。”<sup>①</sup>埃齐亚诺说：“现在让我们抛弃对土地的粗暴使用……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较少让人反感的奴隶生活，我儿时居住的房屋里就存在这样的生活。”<sup>②</sup>道格拉斯说：“我不打算通过绘声绘色地描写难以形容的恐惧来折磨我的读者的感受……（因为）深陷在黑暗与令人作呕的奴隶制度的窠臼中并非我的目的。”<sup>③</sup>莫里森评论说：“为了让体验变得符合那些能缓解它的人的口味，他们对许多事情保持沉默，他们还‘忘记’了许多其他事情。”<sup>④</sup>只有哈里特·雅各布斯的小说《女奴生平》（*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Written by Herself*）的白人编辑莉迪亚·玛丽·蔡尔德（Lydia Marie Child）敢于掀开遮羞布，揭露导致雅各布斯在一个狭小得都无法站立的管道槽内躲藏了七年的性虐待细节。蔡尔德解释道：“我非常明白，把这些内容公之于众会让许多人指责我缺乏教养；因为这个聪明、饱受伤害的女人属于一个被一些人称作优雅的对象阶层，而其他人是粗鄙的。这种奴隶制度的奇怪形态通常被掩盖着；但是公众应该了解它的畸形特征，我很愿意肩负起掀开面纱呈现它们的责任。”<sup>⑤</sup>

莫里森说，作为一名生活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美国黑人女性小说家，她有责任扯掉盖在“糟糕到不可言说的活动”上的遮羞布，她真的道出了美国当代许多女性作家及有色人种作家的心声。莫里森自己说，掀开那层遮羞布需要她信任她自己的记忆并依靠其他人的记忆。“所以记忆深深地影响着我写什么、我如何开始写及我认为什么重要。”<sup>⑥</sup>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曾谈到她自己的内在记忆与造就她的物质记忆，莫里森引用左拉的话说，这样的记忆“是我作品的天然地基。可是记忆与往事不会让我了解到这些人没被写出来的内在生活。只有想象能帮我。”<sup>⑦</sup>

自1987年出版《宠儿》（*Beloved*）起，就她所呈现的风格、结构和自省的叙述声音而言，莫里森自己已经成为了一名后现代作家，但她在作品中利用及创造文化记忆的方式却和唐·德里罗这样的作家很不同。莫里森肯定很相信自己的创作能力，认为她所写的生活在奴隶制度或她所描绘的环境下的非洲裔美国人

的故事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对她而言，她作品的成功主要在于她公平地对待了历史不为人所知或被抹去的人的生活，并让当代读者关心他们，在她帮忙重新构建的文化记忆中赋予了他们新的生活。

相反，德里罗、品钦（Pynchon）、加迪斯（Gaddis）和其他人则认为，当代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不再相信共同的文化记忆这样的东西。正如人们从媒体及日常经验中所了解到的那样，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政策是秘密制定出来的，法庭难以解释的复杂操纵着正义，选举结果不可信任，经济数字被篡改以获得符合意愿的结果，像《爱国者游戏》（*Patriot Game*）、《摇摆狗》（*Wag the Dog*）、《吹牛顾客》（*Bulworth*）、《燃眉追击》（*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天生赢家》（*Bob Robert*）和《风起云涌》（*Primary Colors*）这样的电影可能比官方叙述与新闻报道更能反映权力部门内所发生事情的真相。许多后现代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暗示，美国及美国人患有历史健忘症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再相信他们看到、读到或被告知的事情，如今他们也不相信，投票给一个候选人或党派，而不投给另一个候选人或党派，会导致任何不同。如果没什么事情可以相信，也没什么事情值得记住，那么人们还是去观摩体育比赛或看看“真人秀”好了，至少它们所制造的幻觉很有趣。

在德里罗的《地下世界》一书中，人们感兴趣的是表象、娱乐和现在的美感。幻象是由电脑制作，并投影到屏幕上的，也没什么关系；事实上，如此艳俗的做作更合人心意，因为这些表象、幻象、不真实的东西都很吸引人，能分散人们对他们周遭的乏味的注意力，减轻他们对于自己人生无意义的愤怒。德里罗观察并记录电影和电视对头脑的注意力广度的改变与减损。在《地下世界》里，人们不用脑子地对许多事情上瘾，比如反复观看一个孩子拍摄的一段视频，视频记录了一个男人在他的车内被得克萨斯公路杀手射杀。许多人对金钱、时尚、艺人、运动、比赛用球——比如在小说里汤普森击打的那个棒球就是一个重要的比喻——另一些人则坚持着一些绝对的事物，比如宗教信仰、人种与民族仇恨、对于各种敌人、

① Morrison, Toni. "The Site of Memory." *Inventing the Truth: The Art and Craft of Memoir*. Ed. Russell Baker and William Zinss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5. 90.

② Morrison cites Equiano. Ibid.

③ Morrison cites Douglass. Ibid.

④ Ibid. 91.

⑤ Morrison cites Child. Ibid.

⑥ Ibid. 91-92.

⑦ Ibid. 92.

灾难或疾病的偏执恐惧。由于‘我们’与‘他们’对立的思维在极端偏执的时期盛行,冷战成了指挥如此多的恐惧与愤怒瞄准一个共同敌人的有效途径。冷战的结束造成了文化记忆的一个危机,因为在没有明显敌人的情况下,维持大家对国家伟大过去的信仰变得更为困难——于是,有了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成功”。当然,德里罗写这部小说时,为我们提供了“恐怖主义者”这个新敌人的9·11事件尚未发生。然而,该敌人和隐形的奥萨马·本·拉登却模糊得无法维持关于美国式的自由与荣耀的文化记忆。于是非常显要和熟悉的人物萨达姆·侯赛因不得不成为新的撒旦。

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叙述倾向于解构和批评一切事物,德里罗像莫里森一样,如果他试图“渗透并改变意识,就像作家们过去渴望做到的那样”,他也必须有所信仰。他显然致力于举起一面照出当代社会的镜子,希望一些读者能意识到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浪费,意识到世界——尤其是美国,因为它的富有和强大——正在朝自我毁灭的方向滑行。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德里罗也必须利用文化记忆,对他而言,风险在于浪漫化地描绘早年的美国——那场棒球赛、旧时的邻居之情、兰尼·布鲁斯的幽默、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和反战抗议者、民权运动的领袖和美国南方的示威者——这些都是他的作品构建的美国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但是这样的记忆也可能太具鼓舞作用而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们看不到当时与现在和积极元素共存的破坏力量。比如,德里罗批评了棒球,他广泛探讨了操控棒球运动几十年并至今依然影响着与其相关的某些决定及其粉丝肤色的种族主义。德里罗呼吁并创造积极的文化记忆,与此同时,他承认并叫大家注意文化记忆所具有的欺骗性。但他不想让他的读者们陷入彻底的怀疑与玩世不恭,因为这两种态度可能促使他们不作为,所以他试图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

## 五

一边大谈我们的国家神话,一边忽视历史的教训,这极可能造成美国认为一切都是天注定——不尊重作为其他文化基础的文化神话的力量。确实,如果我们掀开遮盖布,揭开过去的真相,尽可能准确地了解他们,那么最近历史上的军事灾难所带来的基本教训就是:对其他文化的无知或不尊重会导致意料之外的结果和惨重的人力及经济代价,难道不是吗?同样的勇气驱使当年的莉迪亚·玛丽·蔡尔德和现在托尼·莫里森去扯掉那层遮盖布,展现被压迫和被否定

的人与事,艺术家、记者、教师和知识分子都无法接受让人们退进安逸的神话中并否认他们眼前的事实。

如果我们会有一个未来,那么德里罗和其他艺术家正在努力教我们获取一种精神平衡,教我们如何获得文化记忆的支持却不成为它怀旧的、无力的受害者。对于学者,评论家和其他阅读《地下世界》这类作品的人而言,取得这样一个理智与情感的微妙平衡是比较好的结果,但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种策略教给生活在德里罗的小说和美国主流社会里的广大民众呢?我们大多数人拥有的关于这些被催眠的民众的往事的文化记忆,肯定都和现在的恐怖主义者本身一样可怕。对我而言,这种评价中有一点是很明白的,即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学者和教授语言、语言学、文学、电影、历史、宗教的老师的工作及文化研究都将变得比以前更加重要,以处理人类最重要的问题,指导世界各地的学生,尤其是在美国教大家学会尊重并谦恭地尝试理解各个文化背景下的人们。

(金逸明译,张冲校)

## 参考文献

- [1] Axelrod, George, and John Frankenheimer.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Dir. John Frankenheimer. Culver City: MGM, 1962.
- [2] Beatty, Warren, and Pieter van Brugge. *Bulworth*. Dir. Warren Beatty. Beverly Hills, CA: Twentieth Century Fox, 1999.
- [3] Bevan, Tim, et al. *Bob Roberts*. Dir. Tim Robbins. Van Nuys: Paramount/Miramax/ Polygram, 1992.
- [4] Bregman, Anthony, and Steve Golin.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 Dir. Michel Gondry. Universal City: Universal Pictures, 2004.
- [5] Cather, Willa. *My Antonia*. N. Y.: Broadview Press, 2003.
- [6] Demme, Jonathan, et al.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Dir. Jonathan Demme. Hollywood: Paramount Pictures, 2004.
- [7] DeLillo, Don. *Underworld*. N. Y.: New York, 1997.
- [8] —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Lillo.” N. Y.: New York, 1991. SM35-40.
- [9] DeNiro, Robert, et al. *Wag the Dog*. Dir. Barry Levinson. CA: New Line Home Video, 1998.
- [10] Eyre, Richard. *Iris*. Dir. Richard Eyre. Los Angeles: Buena Vista, 2001.
- [11] Faulkner, William. *Absalom, Absalom!* N. Y.:

- Modern Library, 1964.
- [12] Fitzgerald, F. Scott. *The Great Gatsby*. N. Y.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3] Franklin, Benjamin. *Autobiography*. Boston: Bedford Books for St. Martin's Press, 1993.
- [14] Hawthorne, Nathaniel.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N. Y. : Bantam, 1981.
- [15] Hemingway, Ernest. *The Sun Also Rises*. N. Y. : Scribner, 1998.
- [16] Morrison, Toni. *Beloved*. N. Y. : Plume, 1988.
- [17] — “The Site of Memory.” *Inventing the Truth: The Art and Craft of Memoir*. Ed. and Intro. William Zinsser. Boston: Houghton, 1987. 103-124.
- [18] Neufeld, Mace and Robert Rehme.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Dir. Phillip Noyce. Hollywood: Paramount, 1998.
- [19] — *Patriot Games*. Dir. Phillip Noyce. Hollywood: Paramount, 1998.
- [20] Nichols, Mike. *Primary Colors*. Dir. Mike Nichols. Universal City: Universal Home Video, 1998.
- [21] Segal, Peter. *50 First Dates*. Columbia TriStar, 2004.
- [22] Todd, Jennifer and Suzanne Todd. *Memento*. Dir. Christopher Nolan. Culver City: Columbia TriStar Home Entertainment, 2001.
- [23] Woo, John. *Paycheck*. Paramount Home Video, 2004.

# 国家梦想与警醒:美国小说的全球警示

埃默里·埃利奥特 [遗作]  
(河滨加州大学·美国)

“在这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上,真理不得不像一只林地里受惊的白鸽那样飞来飞去;只有通过巧妙的一瞥才能窥视到她的身影,例如在莎士比亚和其他擅长讲述真理的大师的作品中。就仿佛它身形隐蔽,一闪而过……(并非所有的)读者能够看到它,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为最理解她的人所察觉。”

这段话引自麦尔维尔著名的评论——《霍桑和他的青苔》。他赞赏霍桑的能力,因为他能够使读者看到社会的谎言和被冷落的或者被扭曲的人性真理之间的区别。麦尔维尔的祖父是独立战争时期一位革命英雄,麦尔维尔本人也和很多的政治领导者交好。他年轻的时候一度醉心于青年美国的光辉前景。然而他的很多作品是对美国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批判。在他的早期作品,如《泰皮》和《欧姆》中,他的主人公公开批评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批评惹恼了一些评论家,还有作者的家人和朋友。所以,麦尔维尔很快就学会了将他的政治评论隐藏在寓言之中,有时把它们深埋在极具挑战性的文风和复杂的叙事结构之中。在对霍桑的评论中,麦尔维尔公开承认美国的严肃作家如果要批评社会和政治现状,必须采用隐晦的文字。这种说法看起来有点奇怪,在一个以言论自由为傲的国度里,还必须采用这样一种逃避的方式。但是,正是这种标榜的价值和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和差距让麦尔维尔不安。对于美国人不愿进行自我批评,不愿为他们的政策和行为承担责任,特别是涉及国内外的穷人和弱势群体的时候。麦尔维尔的批判与日俱增。这促使他写出了诸如《大白

鲸》、《皮埃尔》、《广场故事》和《大骗子》等作品。其中,他对于美国民主的缺陷与风险的猛烈批评和全面分析,只有“那些最能理解(它们)的人能够察觉到”<sup>①</sup>。

作为一名美国文学学者,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众多美国作家和美国之间的争吵,以及他们用以揭露和剖析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手法。在我的《革命的作家》一书中——此书主要关注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时期,我认为1770—1840年之间的作家意识到他们是美国的第一批职业作家,认为他们有义务写出寓教于乐的作品,或者即使在虚构故事中也实践麦尔维尔后来所说的“讲述真理的伟大艺术”。那些早期作家有一种责任感,甚至义务去写政治小说,让读者意识到他们社会的政治现状,从而成为更好的民主公民。绝大多数此类作家,例如菲利普·弗雷诺、约尔·巴洛(Joel Barlow)、查尔斯·布洛克登·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等,很快就发现社会上的精英和大众中的一小撮读书者都不支持对执政者进行批评的学者和艺术家。很多的富人和有权势的人对作家心存疑虑,在他们看来作家是游手好闲,依赖他人劳动的寄生虫。与此同时,农民和商人认为相信作家对政治和经济领导人的批评没有什么价值。尽管作家有宪法上规定的批判权力,但是人民及其领导者也有对其置之不理的权力<sup>②</sup>。

因此后来的美国作家们就开始采用一些策略,发明了一种具有复杂的多重意义的叙事方式以对抗政府制造的官方神话和国家小说。为此,作家需要在隐晦和直白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因为如麦尔维尔所说,如果读者发现了使其烦恼的真相与宝贵的民族神话不符、挑战了当权者的权威或者破除了想当然的假设的时候,读者应该有一种是她/他自己发现这

① Herman Melville, “Hawthorne and his Mosses,” in *The Portable Melville*, ed. Jay Leyda (New York: Viking, 1952), pp. 408-409.

② See Elliott, *Revolutionary Writers: Literature and Authority in the New Republic, 1725-1810* (New York: Oxford UP, 1982), pp. 3-34.

一隐蔽的真相的错觉。如果读者觉得这一真相是作者强加的,他就会排斥真相及其作者。但即使是学会了这一巧妙的讲述真理艺术的作家仍可能受到出版商的冷落,难以找到读者并且易受评论家的抨击。

这一原则也有例外,例如哈利耶特·比彻·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厄普顿·辛克莱尔的《丛林》,以及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之间兴起的政治题材小说。像德莱塞、诺里斯、伦敦、肖邦、凯瑟、多斯·帕索斯和斯坦贝克等人人都能够找到读者,尽管他们出书时困难重重,还要忍受修改、审查之苦,甚至还会因为某些篇章和主题被指冒犯当局而作品遭禁。

但是,政治小说的辉煌是短暂的,因为新兴的新批评流派对政治小说心存疑虑,认为它艺术逊色,将其挤到美国文学史的边缘。显然,20世纪40年代新批评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的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巨大影响的一种保守的政治反驳。但是新批评者没有从政治立场上抨击政治小说,而是辩称伟大文学的意义都是普世、超然的,因而与政治无涉,而政治小说不配为文学。只有那些具备审美价值的作品才值得在大学课堂上进行研究或者推荐给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阅读,而政治小说自身不具备这些价值。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被新批评家青睐的美国作家,如坡、霍桑、詹姆斯和艾略特等,事实上都很政治化。只是因为新批评流派认为研究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是一种阐释谬误,所以避免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政治阐释。那些想继续写政治小说并争取读者的作家就不得不寻求隐蔽的写作方法<sup>①</sup>。1939年的电影《绿野仙踪》中多萝西的小狗托托走到面目狰狞的巫师背后,拉开帘子,发现原来里面是一个矮小笨拙的堪萨斯男人在操纵杠杆投射影像和放大声音以威慑他的子民。这一众所周知的情景正好说明了民主作家们是如何巧妙地拆穿当权者面具的。艺术家就是一只讨人嫌的小狗。

## 二

众所周知,当前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政治类资料都有很多不确定性或者说各种媒体、组织、政府甚至统计公司发布的信息中的虚构程度仍难以确定。20世纪90年代,我们发现好莱坞电影对政治类题材很感兴趣。戏仿政治的电影如《桃色风云》(Wag the Dog)、《戴夫》(Dave)、《选举追缉令》

(Bullworth)、《饭店》(Parador)等,在电影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拿众人皆知的政治内幕开涮。更严肃一些的电影如《爱国者游戏》(Patriot Games)、《燃眉追击》(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和《毒网》(Traffic)等暗示电影中的情节和行动与现实中政府的某些秘密行动一致或者相似,而且大多数的观众都意识到这些电影不仅仅是以娱乐为目的。当我看完《爱国者游戏》刚要离开时,听到一个观众咕哝说:“我只有看了电影才知道自己的政府在干些什么勾当。”

自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大多数拿政府开玩笑的小说消失了,而且电影人也转向一些更爱国和怀旧的主题。这一趋势实际上在9·11事件以前的电影如《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和《爱国者》中就已流露出来。现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很多人认为跟国家特别是政府开政治玩笑或者进行政治批评就是威胁国家安全,就是威胁想象中存在的民族团结。

然而,来自华盛顿的很多说法,以及媒体发布的观点,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创伤未抚平的时期,将会招致强烈的批评,甚至嘲笑。包括“战争”一词的使用。用战争来描述一场隐秘而且地域分散的对抗,而敌人没有国界,不明确,还有些虚构的色彩。官员们故意散布流言,泄露进攻计划,各方源源不断地为全球媒体以及互联网站提供各种常常真假难辨的信息。发动对伊拉克的无情的战争,极力把萨达姆·侯赛因塑造为唯一的敌人,一方面是为了给这个地域分散的战争一个明确的战场,另一方面是塑造一个邪恶的敌人,作为那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本·拉登看得见的替身。正如一些人所说的,这也可能是政府为了转移民众对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和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的注意力。

但是因为大批的美国民众仍沉浸在9·11事件的创伤之中,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国民众对于“反恐战争”带来的司法以及政府行为程序上的改变保持着让人奇怪的沉默。直到去年秋天,一些评论家才开始就政府的一些行为和计划提出质疑。公众长时间沉默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精力关心反恐战争的相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注意力都在接二连三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所谓的能源短缺致使几个州损失了几十亿美元,加利福尼亚州的损失尤为惨重;联邦公库里几十亿的盈余资金人间蒸发;公司财务欺诈的曝光使安然和世通公司瞬间瓦解<sup>②</sup>;股市下挫吞噬了无数人毕生的积蓄和他们的退休计划。另外,我们了解到很多天主教牧师猥亵儿童,但教会官员对此却秘

<sup>①</sup> Frank Lentricchia,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sup>②</sup> 安然,全球第一大能源交易商;世通公司,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和互联网数据传输公司。两公司因为账目欺诈,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申请破产。

而不宣。2002年夏天还出现了严重的干旱,一系列绑架和谋杀年轻的女子的犯罪案件,以及西尼罗病毒的传播。所有这些事件都严重损害了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很多媒体评论员说,过去一年里,美国失去了她的纯真,永远地改变了。

很明显,美国人很迷惑、害怕,而且愤怒。民意调查显示布什总统支持率很高。政府日益升级的监视、侵犯个人隐私、高度限制甚至歧视性的移民政策、对于媒体报道内容新的限制、政府扣留的信息和言论自由的新限制,对于这一切公众几乎没有公开表示异议。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政府如此威胁公民的人权以至于普通民众什么也不敢说也不敢做,因为害怕遭到调查。司法委员会中一些人已经对许多新政策的合法性表示关注,但是有关此类批评话题的新闻报道和公开讨论只有零星的一点。

此种沉默和默许的一个原因是很多美国人仍处于震惊之中,这种匪夷所思的恐怖袭击竟然发生在美国国土上。因为害怕未来的恐怖袭击,他们觉得政府必须采取任何措施以消除这一威胁。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愿意相信很快一切就会好转,他们不愿意听到问题很严重,其背后有复杂的人为原因,需要经历很长而且复杂的过程才能解决的说法。2002年11月共和党令人吃惊地赢得大选,这一事件表明选民相信尽管经济瘫痪、失业率上升,总统的党派还是应该全权掌控政府以消除恐怖主义。

为了说明现在美国国内众多人困惑的程度,有必要扯远一点,考察一下当前危机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除了对于将来其他袭击的现实担心以外,美国人的信仰系统现在正面临挑战。这一信仰系统自从17世纪以来一直维系着美国的舆论和文化。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绝大多数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相信安全和成功,借助的就是一整套的政治神话和国家叙事: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她的全球使命和命运。这些观念在当前的选择和政治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神话中的很大一部分诞生于新英格兰:美国是《新约》中的耶路撒冷,“山顶之城”和“世界之光”;美国是“与世隔绝”的花园,上帝的选民肩负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在此耕耘;美国是新世界里亚当和夏娃的花园家园,他们远涉重洋时得到了净化,或者因为出生在新世界而没有旧世界里的堕落与邪恶。即使是新移民或者土著人,他们尽管没有清楚地听说此类观念,但他们的行为和思想

也和那些人一样,因为他们通过媒体和大众文化特别是电影中的国家叙事,吸收了那些神话的内涵。这些神话因为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实用,所以长盛不衰:它们能产生自尊和自我牺牲精神;它们有助于实现意见一致、国家统一和树立成功的决心;它们有助于建立一种解决问题和冲突的有效形式<sup>①</sup>。

除了从清教徒那里继承的神话之外,美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摩尼教或者加尔文教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二元对立的选择:美好/邪恶;正义/谬误;我们/他们;美国人/非美国人。植根于其中的比喻和二元对立逻辑,经过18世纪不断的话语重复,嵌入了革命后美国的国家舆论之中。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领导者如果想让民众接受他们的政策,通常要先取得大家的一致认可,这些由来已久的国家根本的形象为各种政策和行动提供了有效支持。虽然那些革命家国父们是理性主义者和自然神论者,对宗教很有戒备之心,但是他们意识到要使得民众支持他们的政策,他们需要借助宗教中的形象和概念。宗教的情感感召有助于统一意见。例如,美国作为一个与世隔绝的伊甸园的形象与门罗主义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解释美国一直以来的孤立主义倾向。

认为可以通过比如星球大战的导弹防护屏障,确保美国的安全;认为自己清白无辜,因此别人不应该对他们不满。这种自我感觉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导致9·11事件的安全疏漏,以及之后美国的迅疾报复。因为冷战的结束,以及对海湾战争后美国在中东地位的公共讨论的缺乏,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于有某个国家或者团体会在美国的国土上发动这样惨烈的自杀式袭击感到目瞪口呆。

袭击之后的几天里,接受采访的民众重复问一个问题:“怎么会有人这么干呢?他们一定是疯了。”最终人们想到了一个合理的动机,这就是其他人嫉妒我们的自由和我们高水平的生活,所以想毁掉我们。几乎没有人意识到,长久以来世界各地出于各种原因敌视美国的绝不仅仅是几个疯子。最终,一些审慎的民众逐步了解到在中东的一些地方、非洲、亚洲、太平洋地区甚至欧洲都有一些怨恨和仇视美国的历史因素。直到今天,在公开场合,甚至包括大学校园,辩论这一袭击背后的复杂问题时面临的阻力依然很大。例如,北卡罗来纳大学要求大学新生读一段古兰经以便在课堂上讨论。州立法会对此极为恼怒而否决了对这一反美项目的资助<sup>②</sup>。

① Sacvan Bercovitch, *The American Jeremiad* (Madison: U Wisconsin P, 1978) and Elliott,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2).

② *Los Angeles Times*, August, 17, 2002, B 20.

### 三

当然很多的学者和作家认识到美国文化中孤立主义思想和美国纯真的信仰并存导致了狭隘地方主义和地域幼稚。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作家们,例如坡、麦尔维尔、霍桑、沃顿、吐温和詹姆斯,通过他们的小说批评诸如此类的民族弱点。20世纪上半叶,很多的美国作家不仅继续进行这种批评,而且还移居海外,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异化了,清教道德和狭隘的地方主义压制了他们的艺术<sup>①</sup>。

早期作家中,对于纯真和孤立主义问题思考最全面的是亨利·詹姆斯。我认为他之所以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深深地担忧美国的民主、选民和当权者不能理解文化差异和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这对于一个即将在全球经济和军事领域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他的很多作品,特别是《美国人》和《大使》,清晰而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美国人的文化近视可能导致的个人关系以及与之相似的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当然,他的作品没有直接描写政治家和外交家,而是采用了隐喻的方式。他派了两个美国旅行者克里斯托弗·纽曼和兰伯特·斯特莱塞去法国处理恋爱事件。纽曼梦寐以求地想娶那个完美的欧洲女人,以此表明他在商业上的腾飞,并向旧金山的亲朋展示他文化上的优雅。斯特莱塞受未婚妻纽瑟姆夫人之托,去寻找她的儿子查德,让他回马萨诸塞继承家族生意。因为她听说他爱上了一个法国女人而且可能永远不回来了。两个美国人的任务都失败了,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竭力想表明自己不狭隘,因而没有注意到一些可以帮助他们成功的细节。

当贝勒加德家族同意他们订婚时,纽曼离迎娶克萊尔·德·赛特勒的目标已经近在咫尺。结果,纽曼决定举办一个盛大的晚会以示庆祝,他邀请了贝勒加德家族上流社会的朋友参加。在晚会上,惊讶于纽曼的趾高气扬,也因为纽曼公开暴露了订婚背后他们家族艰难的经济处境,贝勒加德家族取消了婚约并把克萊尔送到了一个小修道院。纽曼不知所措。志在必得的自信让他变得盲目,结果他没有看到法国

对手的困境以及他们反攻的危险。他忘记了,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仍然要受制于他们的势力。如果纽曼能更深刻的理解他们的处境,而不简单地归因为欧洲人对他这个美国人的偏见,他可能会在贝勒加德家族意识到他们点头同意的后果之前,更谨慎地完成从订婚到结婚的过渡。相反,他那个炫耀的晚会邀请了贝勒加德家族所有的朋友参加,似乎是有意宣告,他已经战胜了他们。詹姆斯作品中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美国人的自我观念、价值和文化癖好会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他们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谈判中的发挥。纽曼铩羽而归。

《大使》这个题目很幽默,它讲述了兰伯特·斯特莱塞让浪子查德回国的努力。这象征着国际谈判游戏。斯特莱塞的失败,首先是因为他被文化差异弄得眼花缭乱。因为急于在法国得到认可,他对于一些重要的事实视而不见。他最大的疏忽在于他们没有马上意识到查德和孔特赛·德·维奥内真心相爱。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还有书中几个人物的明确说明,斯特莱塞几个星期以来仍然执迷不悟。

斯特莱塞领悟的那一刻是美国文学上最滑稽的场景之一。为了放松身心,斯特莱塞去乡下游览一日。当他俯视河流,欣赏如画的风光时,查德和孔特赛进入了他的视野,他猛然意识到他们正在享受恋爱的美好时光。

在这两部作品中,詹姆斯给我们喜剧化地呈现了美国纯真的丧失。这两个人物似乎都从他们的失败中汲取了重要的教训,但是詹姆斯把思考留给了我们:他们是否会因为这些新的认识而改变他们的意识或感觉,又或者面临第二次机会时他们还会重蹈覆辙。

### 四

美国纯真这一神话最有趣的一点是美国多次丧失纯真,只是为了重新找回纯真。很多的事件曾经引发美国纯真终结的呼声,声称美国已经永远改变了。这其中包括内战、暗杀林肯、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提波特山油田丑闻<sup>②</sup>、美西战争、一战、1999年黑袜子世界系列丑

<sup>①</sup> On expatriate writers, see Elliott, ed.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8, pp. 743-852).

<sup>②</sup> 提波特山油田丑闻:1921年,美国当时的内政部长艾伯特·B·福尔,使哈定总统将几个国内石油公司觊觎已久的海军油田从美国海军的名下转移到内政部的名下。这些油田中包括怀俄明州的蒂波特山油田。在没有进行公开竞标的情况下,福尔将油田的钻井权给了石油大亨哈里·F·辛克莱。这一举动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水门事件发生前,蒂波特山丑闻是美国历史上有关总统内阁成员的最大丑闻。